

# 敦煌學

## 第二十九輯

### 【論文】

- 王三慶 《齋琬文》一卷的再研究與補校  
王惠民 敦煌莫高窟第322窟「龍年」題記試釋  
洪國樑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詩經之屬》校錄評議  
洪藝芳 敦煌文獻中奴婢稱謂詞析論  
荒見泰史 敦煌本《齋琬文》等諸齋願文寫本的演變  
——以其與唱導文學的關係為主  
黃亮文 P.4024〈喪服儀〉錄文補證  
楊明璋 論敦煌文學中的善惠故事  
——以 S.3050V、S.4480V、S.3096 為主  
劉瑞明 《下女夫詞》再校釋與古代婚姻文化蘊涵  
蕭文真 由〈金剛經講經文〉至《銷釋金剛科儀》  
——談《金剛經》信仰世俗化之轉變  
簡佩琦 敦煌繪畫「須闍提故事」之研究  
——以文本和圖像為中心

### 【紀念文】

- 謝和耐撰 吳其昱（1915-2011）  
岑詠芳譯  
張廣達 吳其昱先生生平及其學術貢獻  
陳慶浩  
岑詠芳 極高明而道中庸——憶念吳其昱先生  
附錄：吳其昱先生「般若心經梵文校注」遺稿  
柴劍虹 緬懷吳其昱先生  
鄭阿財 我所認識的吳其昱先生  
鄭阿財等 吳其昱先生論著目錄  
何廣棧 蘇瑩輝教授小傳  
何廣棧 蘇瑩輝先生及其敦煌學論著目錄編年  
王惠民 賀世哲先生與敦煌學研究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2012年3月

封面題字 臺靜農先生

創刊人 潘重規先生

編輯委員 王三慶 朱鳳玉 李玉珉 柴劍虹  
高田時雄 榮新江 鄭阿財 鄭炳林

主 編 鄭阿財

---

## 《敦煌學》稿約

- 一、本刊為敦煌學專業之刊物，園地公開，歡迎海內外學者賜稿。
- 二、來稿以未曾發表之中文稿為限。所有稿件經審查通過後始予刊登。
- 三、論著稿件以二萬字為原則；書評稿以六千字為度。特約稿件不在此限。請儘量提供與 Microsoft Word 相容之完稿磁片或電子檔。
- 四、來稿請標明中、英文篇名，並附個人簡歷(含工作單位、職稱)及通訊資料。
- 五、來稿一經刊登，即致贈作者該刊物一冊及電子檔一份。
- 六、如需《敦煌學》論文撰寫格式或投稿，請逕寄：621 嘉義縣民雄鄉中正大學郵局 56 號信箱。或寄電子郵件至：atcheng@mail.nhu.edu.tw

nhdh5770@gmail.com

# 目次

## 【論 文】

- 《齋琬文》一卷的再研究與補校-----王 三 慶 1
- 敦煌莫高窟第 322 窟「龍年」題記試釋-----王 惠 民 17
- 《敦煌經部文獻合集·群經類詩經之屬》校錄評議-----洪 國 樑 33
- 敦煌文獻中奴婢稱謂詞析論-----洪 藝 芳 87
- 敦煌本《齋琬文》等諸齋願文寫本的演變-----荒見泰史 119  
——以其與唱導文學的關係爲主
- P.4024〈喪服儀〉錄文補證-----黃 亮 文 147
- 論敦煌文學中的善惠故事-----楊 明 璋 161  
——以 S.3050V、S.4480V、S.3096 爲主
- 《下女夫詞》再校釋與古代婚姻文化蘊涵-----劉 瑞 明 179
- 由〈金剛經講經文〉至《銷釋金剛科儀》-----蕭 文 真 205  
——談《金剛經》信仰世俗化之轉變
- 敦煌繪畫「須闍提故事」之研究-----簡 佩 琦 221  
——以文本和圖像爲中心

## 【紀念文】

- 吳其昱（1915-2011）-----謝和耐撰、岑詠芳譯 243
- 吳其昱先生生平及其學術貢獻-----張 廣 達、陳 慶 浩 247
- 極高明而道中庸——憶念吳其昱先生-----岑 詠 芳 253  
附錄：吳其昱先生「般若心經梵文校注」遺稿
- 緬懷吳其昱先生-----柴 劍 虹 259
- 我所認識的吳其昱先生-----鄭 阿 財 265

|                               |         |
|-------------------------------|---------|
| 吳其昱先生論著目錄-----                | 275     |
| 鄭阿財、朱鳳玉編，李燕暉增補，榮新江、劉波校訂，岑詠芳再訂 |         |
| 蘇瑩輝教授小傳-----                  | 何廣棧 283 |
| 蘇瑩輝先生及其敦煌學論著目錄編年-----         | 何廣棧 285 |
| 賀世哲先生與敦煌學研究-----              | 王惠民 311 |

# 敦煌莫高窟第 322 窟「龍年」題記試釋

王惠民\*

現在有許多學者關注到粟特人在敦煌的活動情況，有多篇文章問世。<sup>1</sup>但古代敦煌少數民族除了粟特人之外，還有吐谷渾、吐蕃、回鶻、西夏、蒙古等其他少數民族，如突厥人或許在隋唐間活動在敦煌，其中唐初建造的敦煌莫高窟第 322 窟可能與突厥人存在關聯，殊堪注意。

## 一、初唐 322 窟「龍年」題記

敦煌莫高窟第 322 窟為初唐早期洞窟，坐西向東，平面方形，覆斗形頂，西壁開雙層龕，東西進深、南北寬均為 3.4 米。

西壁：

龕內塑像一鋪 7 身（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二天王），外層龕北側下方有題記 3 行，說見下；龕內西壁下方靠近主尊佛座南側畫鹿頭梵志、對應北側畫尼乾子；內層龕頂畫佛傳（北側乘象入胎、南側夜半逾城）；外層龕頂中央畫一禪定佛二禪定比丘，兩側各畫一身有羽毛的異獸，其中北側一身托有彎角的山羊，南側一身似托綿羊（似無角，畫面有些模糊）；龕外上方兩側畫維摩詰經變（南側維摩詰、北側文殊）。

---

\* 敦煌研究院考古所研究員。

<sup>1</sup> 關於粟特人的族屬存在不同觀點。一種說法是，粟特地區居住著伊蘭（伊朗）人、月支人，伊蘭人是土著人，屬於白種人；月支人即昭武九姓，指漢代從河西走廊昭武城一帶西遷的月支人（河西四郡的張掖郡下設 10 縣，其中有昭武縣，西晉司馬炎為避諱其父司馬昭而改名臨澤，今臨澤縣仍有昭武村），屬於黃種人。土著的伊蘭人主要從事農業，而西遷的月氏人（昭武九姓）從事畜牧業與商賈。因此有學者認為應該將土著人和昭武九姓區別，不能稱粟特人，合稱時應該稱九姓胡（九姓是指昭武九姓，胡是指伊蘭人）。參許序雅《粟特、粟特人與九姓胡考辨》，《西域研究》2007 年第 2 期。另一種說法是，「昭武」是粟特語「城主」之意，與河西走廊的「昭武城」無關，昭武九姓不是月氏族，而是中亞民族。筆者暫從後一種說法。參陳海濤〈昭武九姓族源考〉，《西北民族研究》2000 年第 2 期。

窟頂：

藻井井心畫纏枝花卉，井心四壁中央畫禪定佛一身、兩側畫葡萄紋。窟頂四披畫千佛，四披上部各畫飛天 4 身。飛天多數有鬚鬚，髮式也頗奇特，為本窟一大特點，筆者未能研究（突厥人披髮，粟特人髯須捲髮。《資治通鑑》卷 191「武德七年八月」條記載突厥阿史那思摩「貌類胡，不類突厥。」可見突厥人與粟特在人種上存在區別，在考古資料上，安伽墓可為代表。<sup>2</sup> 322 窟飛天既非長髮披肩，也非髯鬚捲髮，筆者不能判定其族屬）。

南壁：

中央畫倚坐佛說法圖（一佛六脅侍菩薩二供養菩薩，當是彌勒佛說法圖）、四周圍繞千佛。

北壁：

畫結跏趺坐佛說法圖（一佛二菩薩，下方寶池 8 身化生，當是阿彌陀佛說法圖。但由於佛身後雙樹上有樂器，這與《藥師經》所說佛在樂音樹（音樂樹）下說法頗接近，也有可能是藥師佛說法圖），四周圍繞千佛。

東壁：

門上畫三鋪說法圖（均為一佛二弟子二菩薩），中央一鋪主尊蓮座下榜題已漫漶，榜題南側畫二胡跪男供養人，前面一身似雙手持長柄香爐、後面一身持物不明，北側畫一胡跪女供養人，籠袖，抹胸長裙；身後站一男裝侍從，籠袖而立，著圓領男袍。南側說法圖下方榜題也漫漶，榜題南側畫一男供養人，胡跪（或坐姿），著圓領長袍，持長柄香爐，榜題北側畫一比丘坐像，持物不明，似為禪定。北側說法圖下榜題漫漶，榜題南側畫一胡跪男供養人，著圓領長袍，持長柄香爐，榜題北側畫一胡跪女供養人，著抹胸長裙，持一莖長蓮。東壁門南畫藥師佛并二菩薩，下方有榜題，榜題南側畫一男供養人，胡跪於地，手勢不明，榜題漫漶。北側畫一女供養人，胡跪於地，手勢不明，似乎雙手合十，前面榜題：「亡母陰……」

<sup>2</sup> 安伽（西元 518-579）的墓志銘題「大周大都督同州薩保安君墓志銘」，安伽父親安突建曾任眉州刺史，可見此家族入華已久，但安伽墓圖像依然帶有濃厚的粟特風格，胡人（粟特人）多捲髮、戴帽。安伽墓考古報告見：陝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北周安伽墓》，北京：文物出版社，2003 年。

（從榜題痕迹看，後面還可以寫五六字，可能是「亡母陰氏一心供養」）。東壁門北原無畫，盛唐晚期補畫一菩薩立像，菩薩上半身兩側各畫二佛。<sup>3</sup>

此窟壁畫與塑像均保存完整，窟形與壁畫風格與 56、57、203 窟比較接近，考古專家與藝術史專家一致認為上述諸窟是初唐最早的一批洞窟之一，如：史葦湘先生在〈關於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一文中提到：

第 57、203、209、322 窟是一批十分寶貴的武德至貞觀初年的洞窟。<sup>4</sup>

段文杰先生在〈創新以代雄：敦煌石窟初唐壁畫概況〉一文中將初唐洞窟分為三期：

在 228 個唐窟中，初唐窟共 44 個，如果按時間先後排列，大體可分為三期：一、武德期，主要指未受中原影響、仍然保持隋末餘風的洞窟，如 390、392、244、314 等窟。二、貞觀期，指唐太宗定河西平高昌之後的洞窟，如 203、209、205、57、322、71、220、431 等窟。三、武周期，指武則天執政時期的洞窟，如 335、329、331、321、334、332、323、378、328 等窟。<sup>5</sup>

按：段先生提到的 4 個武德窟在樊錦詩先生等石窟考古分期上歸於隋代第三期。220 窟有具體紀年，代表「唐太宗定河西平高昌之後的洞窟」，而 57、203、322 窟似乎屬於唐太宗平高昌之前的洞窟。

樊錦詩、劉玉權先生在〈敦煌莫高窟唐前期洞窟分期〉一文中將唐前期 118 個洞窟分為四期，第一期「當在唐高祖、太宗、高宗初期這個時期。」新開洞窟 14 個。完成的有 12 個：57、60、203、204、206、209、283、287、322、373、375、381 窟，未完工的有 2 個：329、386 窟。另外，續修隋代 401 窟。<sup>6</sup>

322 窟的維摩詰經變、彌勒佛說法圖、阿彌陀佛說法圖、藥師佛說法圖、乘象入胎與夜半逾城、尼乾子與鹿頭梵志等主要壁畫題材也流行其他洞窟，東壁

<sup>3</sup> 關於東壁門北這鋪一菩薩并四佛圖像的年代，筆者 2011 年 7 月請關友惠老師、施萍婷老師、顏娟英老師等考察分析，深表感謝。至於為何初唐未繪壁、一菩薩并四佛圖像內容諸問題，筆者百思不得其解，有待高人指教。

<sup>4</sup> 敦煌研究院編《敦煌莫高窟內容總錄》，北京：文物出版社，1982 年，頁 180。

<sup>5</sup> 中國壁畫全集編輯委員會《中國壁畫全集》「敦煌（5）：初唐」，瀋陽：遼寧美術出版社，1989 年，頁 3。

<sup>6</sup> 載敦煌研究院編《敦煌研究文集》「敦煌石窟考古篇」，蘭州：甘肅民族出版社，2000 年。

10 身供養人也是漢裝。但該窟還存在有獨特的非漢族文化因素，如：西壁北側天王下部後面的壁畫上有 3 處文字，字迹清楚，東起第一條是「張生太子安(史?) □ (此字清楚，但不識為何字，類似「倍」字) 生□ (為斜的一橫，類似「一」字)」，不知何意。另二條更難釋讀，一條可以推測第一個字似乎是「安」(也有可能是「史」) 字，另一條有 6 字，均無法釋讀(從筆劃上看，與突厥文、粟特文區別較大，而似乎接近吐火羅文)，上述三條題記似乎是少數民族人模仿的漢字(此類模仿漢字而又難以讀通的文字在初唐 333 窟也可見到)，從位於塑像身後的位置看，似乎是建窟之初時書寫。(圖版 1、2、3)

此窟西壁內層龕沿畫葡萄圖案、龕頂畫二身有羽毛的異獸(有學者稱謂「人非人」)，北側一身手托綿羊、南側一身模糊，似乎托山羊。葡萄紋樣是粟特地區流行的紋樣，粟特諸神中有托駱駝、托羊等護法神，唐前期敦煌從化鄉是以粟特人爲主的胡人聚落，這些都是理解 322 窟的歷史與文化背景。2011 年，沙武田博士發表〈莫高窟第 322 窟圖像的胡風因素——兼談洞窟功德主的粟特九姓胡人屬性〉一文，認爲「莫高窟初唐第 322 窟即是流寓敦煌的粟特九姓胡人營建的功德窟。」<sup>7</sup>

但粟特因素并不等於是粟特人開鑿的，突厥汗國深受漢族文化、粟特文化熏陶，敦煌與突厥接壤，筆者感覺突厥人與此窟存在關聯的可能性更大些。

先看東壁門南一則發願文。東壁門南畫藥師佛立像并二菩薩，下方有一方漢文發願文(圖版 4)，約 8 行，多數漫漶，今存約 10 字，試借助數碼技術，在《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記錄的基礎上，記錄如下(個別文字仍須斟酌)：

|   | 《敦煌莫高窟供養人題記》 | 本文釋讀  |
|---|--------------|-------|
| 1 | □夫……         | 若夫……  |
| 2 | 斲……          | 喻……   |
| 3 | 里言……         | 釐善……  |
| 4 | □(龍)年……      | 龍年……  |
| 5 | 慟威……         | 性滅罪…… |
| 6 | 家眷……         | 家眷……  |
| 7 | ……           | 願……   |
| 8 | ……           | ……    |

<sup>7</sup> 《故宮博物院院刊》2011 年第 3 期。

現存諸字書法極佳，與龕內 3 條題記的書法形成鮮明的對比。大致推斷東壁門南藥師三尊像下的發願文出自漢族人之手，而龕內 3 條題記似為少數民族人隨手題寫，他們可能是游人，也許是工匠。

發願文中的「龍年」二字基本清楚。(圖版 5) 2004 年，姜伯勤先生出版《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一書，專設〈莫高窟 322 窟持動物畏獸圖像——兼論敦煌佛窟畏獸天神圖像與唐初突厥祆神崇拜的關聯〉一章，文中注意到前揭題記中的「(龍)年」二字的價值，指出：

不稱『辰年』而稱『龍年』，正暗示出窟主史氏或為突厥裔，或為粟特裔。

8

這是非常重要的見識，因為用龍等十二生肖來紀年在漢地并不流行，而是突厥等少數民族的紀年法，岑仲勉先生考證說：

從突厥古碑刻觀之，沙鉢略書所謂「辰年」者，原文應為「龍年」，彼方只有十二屬，并無十二支。不空譯《宿曜經》云「西國以子丑十二屬記年，以星曜記日。」則中亞亦有此習慣。<sup>9</sup>

按：此處所謂《沙鉢略書》是指隋初辰年突厥汗國第六代可汗沙鉢略致隋文帝的書信，見《隋書》卷 84〈突厥傳〉：

沙鉢略遣使致書曰：辰年九月十日，從天生大突厥天下賢聖天子伊利俱盧設莫何始波羅可汗致書大隋皇帝……

沙鉢略在 579~587 年在位，期間的辰年只有一個即開皇四年（584）。又，突厥文《磨延啜碑》主要記載回紇第二代可汗磨延啜（英武可汗，葛勒可汗，747~759 年在位）的生平事迹，關於年代均以生肖紀年，如朝北一面第 9 行：

羊年（743 年），我出征了。<sup>10</sup>

粟特與突厥關係密切，是否粟特也有生肖紀年法呢？筆者對粟特文獻完全陌生，在所知有限的資料中，有矛盾的記載。不空譯《宿曜經》提到「西國以子丑十二屬記年，以星曜記日。」似乎西域存在使用十二生肖紀年法，筆者無能力研究。但有資料顯示粟特不用生肖紀年，至少筆者知道的粟特文獻是用「城主第幾

<sup>8</sup>姜伯勤《中國祆教藝術史研究》，北京：三聯書店，2004 年，頁 224。

<sup>9</sup>岑仲勉《隋唐史》上冊《隋史》第 7 節「突厥文化、風俗與我國之比較」，北京：中華書局，1982 年，頁 22。

<sup>10</sup>耿世民《古代突厥文碑銘研究》，北京：中央民族大學出版社，2005 年，頁 195。

年」來紀年的，如：

1907年，斯坦因在敦煌長城烽燧發現的8件粟特文文書中，第2件最長，尾署年月是「此信寫於Cyrdswn(晉)，城主第十三年十月。」陳國燦先生認為：

敦煌所出粟特文二號書信，當是康國某大型商團首領納尼班達在涼州首府姑臧城寫回的信件，其書寫時間在西晉永嘉六年八月，即公元312年10月。<sup>11</sup>

1933年，蘇聯學者在今塔吉克加盟共和國境內穆格山發現一批粟特文書，「穆格」在塔吉克語中為「王」的意思，該城堡位於片治肯特城以東60餘公里的扎拉夫尙河與其支流庫馬河匯合處，是片治肯特的粟特王公迪瓦什梯奇（或譯作季瓦斯季奇）的一座要塞，722年被阿拉伯軍攻毀。穆格山發現的文書有90多件，除一件阿拉伯文、三件漢文外，均為粟特文，紀年是「第幾年」，不用生肖紀年，馬小鶴先生介紹說：

穆格山粟特文書中迪瓦什梯奇有紀年的文書共有十件。其中寫明第六到第十四年的文書，迪瓦什梯奇稱噴赤領主，另有兩份文書分別寫明粟特王薩末建領主第一年和第二年。<sup>12</sup>

蔡鴻生先生在《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中指出：

從穆格山文書中，則可看出他們是按國王或城主在位的年序計歲的。如《婚約》訂於「突昏王十年」、《買地契約》訂於「片治城主侯斤·啜·毗伽十五年」等等。

穆格山出土粟特文書No.3和No.4，是一份訂於康國王突昏十年（710）的婚約，正文和附件分別在兩個皮張上雙面書寫，共九十行。一式兩份，現存文書為女方持有的副本。<sup>13</sup>

有一些學者認為突厥的生肖紀年法不是自有、也不是西來，而是來自中原。路易·巴贊在《突厥曆法研究》第三章「突厥人與十二生肖曆法」中指出：

<sup>11</sup> 關於敦煌粟特文獻，研究者甚眾，此據陳國燦〈敦煌所出粟特文信札的書寫地點和時間問題〉，原載武漢大學歷史系編《魏晉南北朝隋唐史資料》第7輯，1985年。此據陳國燦個人文集《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2002年，頁71。

<sup>12</sup> 馬小鶴〈米國鉢息德城考〉，《中亞學刊》第2輯，北京：中華書局，1987年。此據馬小鶴《摩尼教與古代西域史研究》，北京：中國人民大學出版社，2008年，頁346。

<sup>13</sup>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年，頁32、23。

古突厥人肯定是從 6 世紀下半葉起，從中國中原借鑒了這種紀年，我覺得其歷史背景很清楚。<sup>14</sup>

蔡鴻生先生在《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中也認為突厥人的生肖歷來自中原：

總結上面的意思，可知突厥年代學中的十二生肖，決不是草原物候演進的自然結果，它很可能是由絹馬貿易的中介九姓胡從河西導入『北蕃』的，時間大概在六世紀下半期。如果此說不謬，那麼，生肖曆在突厥汗國的傳播，就成為中世紀一段『蕃、漢、胡』文化交流的佳話了。<sup>15</sup>

所以我們暫時把「龍年」比定為突厥紀年法。問題是，由於此「龍年」二字位於題記中間，而不是尾署，此「龍年」似乎不是建窟時間。那麼，為何在發願文的正文中間出現「龍年」二字呢？需要予以解讀。

## 二、隋至初唐時期突厥與敦煌二三史事

前揭姜伯勤先生文章的副標題提到「唐初突厥祆神崇拜」，而不是「唐初粟特祆神崇拜」，大約與東壁「龍年」題記有關，又正文的結尾推測 322 窟「窟主史氏或為突厥裔，或為粟特裔。」沒有最後肯定。姜先生文章啟發我們思考敦煌是否受到突厥的影響。

前揭沙武田博士論文將 322 窟西壁題記中的「史」字比定為「安」字，應當可信。他將「安」姓直接比定為粟特「安國」的姓氏，忽略突厥也有「安姓」之史實。

P.2657、P.3018、P.3559《天寶十載差課簿》中，從化鄉的人名保留完整，多數為胡姓，學界一致認為是胡人聚落。對敦煌胡人聚落的研究以池田溫先生功勞最著，早在 1965 年，池田溫先生就在《歐亞文化研究》第 1 號發表傳世之作〈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他在分析從化鄉居民姓名時指出：

在居民的胡式人名當中，可以散見一些使用突厥語彙的情況。譬如康逸斤（Irkin）、賀吐屯（Tudun）、羅特勤（Tigin）、何莫賀咄（Baratur）、安達

<sup>14</sup> 路易·巴贊著，耿升譯《突厥曆法研究》，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169。

<sup>15</sup>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181。

漢 (Tarqan)、安烏蘇密 (Ozmiš) 等就是如此。<sup>16</sup>

即康姓、何姓、安姓未必是粟特人，他們可能是突厥人，或者是突厥化了的粟特人（如安史之亂的安祿山、史思明均來自突厥部落，《新唐書·哥舒翰傳》記載：「祿山謂翰曰：『我父胡，母突厥。公父突厥，母胡。族類本同，安得不親愛？』」）。

突厥汗國有許多突厥化的粟特人。《隋書》卷 67〈裴矩傳〉記載大業十年（614）隋煬帝與裴矩商議離間粟特人與突厥關係：

矩又言於帝曰：「突厥本淳，易可離間，但由其內多有群胡，盡皆桀黠，教導之耳。臣聞史蜀胡悉尤多奸計，幸於始畢，請誘殺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馬邑，欲共蕃內多作交關，若前來者，即得好物。」胡悉貪而信之，不告始畢，率其部落，盡驅六畜，星馳爭進，冀先互市。矩伏兵馬邑下，誘而斬之。

可見突厥境內的粟特人很多。《資治通鑒》卷 193 記載貞觀四年（630）六月：

丁酉，以阿史那蘇尼失為北寧州都督，以中郎將史善應為北撫州都督。壬寅，以右驍衛將軍康蘇密為北安州都督。

其中的史善應當來自粟特、康蘇密當來自康居。

蔡鴻生先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一書是我們瞭解突厥與粟特關係的重要著作，蔡先生在該書〈突厥年代學中的十二生肖〉一章中論及粟特文化對突厥文化影響時指出：「當代突厥學、粟特學和漢學，越來越令人信服地證明，這群『亞洲內陸的腓尼基人』，是突厥胡化和漢化的媒介。」《周書》卷 50〈突厥傳〉記載，大統十一年（545）太祖遣酒泉胡安諾盤陀出使突厥。「從此之後，九姓胡滲入突厥社會生活的過程，日益明顯。康、安、史三姓的地位，尤其突出。至始畢可汗時代（608-619），突厥境內，胡已成『群』，能夠對汗庭的政策施加影響了。」<sup>17</sup>

既然突厥深受粟特影響，322 窟出現粟特風格的壁畫是粟特人所為，還是與突厥有關呢？如果敦煌存在突厥人的話，就存在後一種可能。

敦煌乃華戎所交一都會，《隋書》卷 67〈裴矩傳〉記載：

<sup>16</sup> 此據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9 卷「民族交通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

<sup>17</sup> 蔡鴻生《唐代九姓胡與突厥文化》，北京：中華書局，1998 年，頁 178-180。

帝復令矩往張掖，引致西蕃，至者十餘國。大業三年（607），帝有事於恒岳，咸來助祭。帝將巡河右，復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說高昌王麴伯雅及伊吾吐屯設等，啖以厚利，導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設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國謁於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錦罽，焚香奏樂，歌舞喧噪。復令武威、張掖士女盛飾縱觀，騎乘填咽，周亘數十里，以示中國之盛。

時在大業五年（609）。那麼，是否可以找到流寓敦煌的突厥人的痕迹呢？

前揭池田溫先生〈八世紀中葉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一文提到許多觀點，與本文相關的一些觀點是：

1. 從化鄉的戶數約為 284 戶。假如以每戶 5 人計算，從化鄉的總人口約為 1400 人。
2. 這一聚落中的大多數居民本來應當是以商人身份移居到敦煌的。
3. 敦煌的伊蘭人聚落并不是由三三兩兩的移民陸續彙聚到一起而逐漸形成的僑民居住區。
4. 本文所論述的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大概也是在初唐時期建立的，其時間上限最早是在隋代，下限最晚是在七世紀中葉。<sup>18</sup>

其中第 2 和第 3 條結論似乎存在抵牾，常理而言，商人們的居住區應該是逐漸形成的。既然「敦煌的伊蘭人聚落并不是由三三兩兩的移民陸續彙聚到一起」，那就是成批遷徙。另外，如果從化鄉居民是「以商人身份移居到敦煌」，是否意味著他們就從商人轉變為農業人口了呢？

如果把池田先生揭示出的從化鄉一些現象放到初唐歷史背景上考察，我們覺得從化鄉更可能是為戰爭移民而設，相關資料舉例如下：

史料一：

《北史》卷 99〈突厥傳〉記載突厥圍攻酒泉一事：

<sup>18</sup> 此據劉俊文主編《日本學者研究中國史論著選譯》第 9 卷「民族交通卷」，北京：中華書局，1993 年，頁 152、197、192、193。關於大谷文書 1401 號見注解 84。又，陳國燦〈武周瓜、沙地區的吐谷渾歸朝事迹〉一文也涉及大谷文書 1401 號中的從化鄉，并有錄文，載敦煌研究院編《1983 年全國敦煌學術討論會文集·文史、遺書編》（上），蘭州：甘肅人民出版社，1987 年，頁 8。

宣政元年（578）四月，他鉢遂入寇幽州……是冬，他鉢復寇邊，圍酒泉，大掠而去。

《資治通鑒》卷 173 也記此事。

## 史料二：

史萬歲配戍敦煌時出擊突厥。史萬歲（549-600）為隋代名將，《隋書》記載隋初史萬歲發配敦煌時參加與突厥的戰爭，推測可能有突厥戰俘流落到敦煌。《隋書》卷 53〈史萬歲傳〉記載：

爾朱績以謀反伏誅，萬歲頗相關涉，坐除名，配敦煌為戍卒。其戍主甚驍武，每單騎深入突厥中，掠取羊馬，輒大克獲。突厥無眾寡莫之敢當。其人深自矜負，數罵辱萬歲。萬歲患之，自言亦有武用。戍主試令馳射而工，戍主笑曰：『小人定可。』萬歲請弓馬，復掠突厥中，大得六畜而歸。戍主始善之，每與同行，輒入突厥數百里，名警北夷。竇榮定之擊突厥也，萬歲詣轅門請自效。榮定數聞其名，見而大悅。因遣人謂突厥曰：『士卒何罪過，令殺之？但當各遣一壯士決勝負耳。』突厥許諾，因遣一騎挑戰。榮定遣萬歲出應之，萬歲馳斬其首而還。突厥大驚，不敢復戰，遂引軍而去。由是拜上儀同，領車騎將軍。

竇榮定出擊突厥是隋初一次大規模對突厥戰爭，時在開皇二年（582），《隋書》卷 84〈突厥傳〉記載：

以河間王弘、上柱國豆盧績、竇榮定、左僕射高穎、右僕射虞慶則，并為元帥，出塞擊之。

史萬歲參與開皇二年戰役一事還見於《史射勿（543-609）墓志》：

開皇二年（582）從上開府、歧章公李軌出向涼州，與突厥戰於城北。又隨史萬歲羅截奔徒。

據羅豐先生考證，此李軌為李賢之子（李賢妻〈吳輝墓志〉記載：「次子孝軌」，《李賢墓志》記載：「次子軌」）。<sup>19</sup>

<sup>19</sup> 羅豐〈隋唐史氏墓志〉，載氏著《胡漢之間——絲綢之路與西北歷史考古》，北京：文物出版社，2004年，頁435-436。

### 史料三：

《北史》卷 96 記載：

煬帝即位，伏允遣子順來朝。時鐵勒犯塞，帝遣將軍馮孝慈出敦煌禦之，戰不利。鐵勒遣使謝罪請降，帝遣黃門侍郎裴矩慰撫之，諷令擊吐谷渾以自效。鐵勒即勒兵襲破吐谷渾。

《資治通鑒》卷 180 將此事系於大業三年（607）。鐵勒犯塞，馮孝慈出敦煌禦之，可見敦煌是對突厥統治下的鐵勒部戰爭的前沿。

### 史料四：

《冊府元龜》卷 183 記載武德元年（618）七月：

突厥闕可汗遣使內附，闕可汗附於李軌，隋西戎使者曹瓊據甘州誘之，乃更附瓊，與之拒軌，為軌所敗，竄於達斗拔古。

據同書卷 977 記載，闕可汗有「控弦三千餘騎。」同書卷 1000 記載「尋為李軌所滅，部眾皆散盡，歸於西蕃。」

### 史料五：

《舊唐書》卷 109「契苾何力傳」、《資治通鑒》卷 194 等記載：貞觀六年（632），活動在天山、阿爾泰山一帶的鐵勒之契苾部酋長何力（？-677）率一千余家至沙州請降（《資治通鑒》卷 194 云 6000 餘家），詔安置甘涼間。

### 史料六：

《舊唐書》卷 57「公孫武達傳」記載：

貞觀初，檢校右監門將軍，尋除肅州刺史。歲餘，突厥數千騎、輜重萬餘入侵肅州，欲南入吐谷渾。武達領二千人與其精銳相遇，力戰，虜稍却，急攻之，遂大潰，擠之於張掖河。

上述資料顯示，敦煌一帶是隋代對突厥作戰的前沿地區之一，或許有散落的突厥人。突厥族的阿史那姓有時簡化為史姓，322 窟西壁龕內的「安」（此字也

許可能是「史」字) 姓有可能是突厥姓。根據以上歷史文獻記載，322 窟可能與何力率千餘家突厥統治下的鐵勒人至敦煌存在某些關聯。<sup>20</sup>前揭池田先生大作提出：「本文所論述的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大概也是在初唐時期建立的，其時間上限最早是在隋代，下限最晚是在七世紀中葉。」期間敦煌最大一次外族內附是突厥統治下的鐵勒部何力率千余家至敦煌內附，值得特別關注。

### 三、貞觀三年何力至敦煌內附與從化鄉的設立

北周至唐前期，突厥控制著包括粟特地區在內的中亞廣大地區。552 年伊利可汗大敗柔然，稱汗建國，旋卒，阿逸可汗即位，553 年卒，木杆可汗即位，在位 20 年間(553-572)，將突厥推向盛世，《周書》卷 50〈突厥傳〉記載木杆可汗：

西破嚙噠，東走契丹，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諸國，其地東自遼海以西，西至西海萬里，南自沙漠以北，北至北海五六千里，皆屬焉。

隋末戰亂，諸侯紛紛向突厥稱臣，《隋書》卷 84〈突厥傳〉記載：

隋末亂離，中國人歸之者無數，遂大強盛，勢陵中夏。迎蕭皇后置於定襄，薛舉、竇建德、王世充、劉武周、梁師都、李軌、高開道之徒，雖僭尊號，皆北面稱臣，受其可汗之號，使者往來相望於道也。

這裡還「遺漏」唐王李淵稱臣突厥事：《大唐創業起居注》卷 1 記載，大業十三年(617)五月：

突厥數萬騎抄逼太原……(李淵)即立自手疏與突厥書，曰：「……當今隋國喪亂，蒼生困窮，若不救濟，終為上天所責。我今大舉義兵，欲寧天下，遠迎主上還。共突厥和親，更似開皇之時，豈非好事！且今日陛下雖失可汗之意，可汗寧忘高祖之恩也。若能從我，不侵百姓，征伐所得，子女玉帛，皆可汗有之。」

六月，李淵起兵太原，遣使(劉文靜)至突厥請援：

於是遣使以衆議馳報突厥。始畢依旨，即遣其柱國康鞘利、級失、熱寒、

<sup>20</sup> 嚴格說來，鐵勒部不是突厥人，但由於從 546 年起就在突厥汗國統治下，風俗習慣也大致相同，屬於突厥文化圈。《冊府元龜》卷 961 記載：「鐵勒，匈奴之苗裔也。無君長，分屬東、西兩突厥。……其俗大抵與突厥同。」本文為敘述方便，將鐵勒部歸於突厥人。感謝甘肅省二級領軍人才楊富學博士後提醒注意二者的區別。

特勤、達官等，送馬千匹來太原交市，仍許遣兵送帝往西京，多少惟命。

《冊府元龜》卷 654 記載：

襄武郡公（李）琛，高祖爲唐王時，使突厥，結和親還。

岑仲勉先生考知事在武德元年八月。<sup>21</sup>《貞觀政要》卷 2 記載貞觀四年（630）定襄道行軍總管李靖大破突厥：

太宗大悅，顧謂侍臣曰：「朕聞主憂臣辱，主辱臣死，往者國家草創，突厥強梁，太上皇以百姓之故，稱臣於頡利，朕未曾不痛心疾首，志滅匈奴，坐不安席，食不甘味。今者暫動偏師，無往不捷，單于稽顙，耻其雪乎。」

貞觀年間，中原與突厥的關係發生了逆轉，貞觀四年李靖大破突厥，此後逃難到塞外的內地人紛紛回歸故里，突厥人也大量內附。《貞觀政要》卷 9 記載：

貞觀四年，李靖擊突厥頡利，敗之，其部落多來歸降者，詔議安邊之策。……自幽州至靈州，置順、佑、化、長四州都督府以處之，其人居長安者近且萬家。自突厥頡利破後，諸部落首領來降者皆拜將軍、中郎將，布列朝廷，五品已上百餘人，殆與朝士相半。

《通典》卷 200 記載：

大唐貞觀中，戶部奏言：中國人自塞外來歸，及突厥前後降附，開四夷爲州縣者，男女百二十余萬口。

在此背景下，我們再回到前揭池田先生的大作。池田先生在大作中已經感覺到敦煌的粟特人聚落中存在突厥因素，他在前揭大作分析從化鄉居民姓名時指出：

在居民的胡式人名當中，可以散見一些使用突厥語彙的情況。譬如康逸斤（Irkin）、賀吐屯（Tudun）、羅特勤（Tigin）、何莫賀咄（Baratur）、安達漢（Tarqan）、安烏蘇密（Ozmiš）等就是如此。敦煌漢人的名字已經知道了許多，但是其中却幾乎見不到這類受突厥語影響的人名。因此對於這些突厥語人名，只能做出如下解釋。即由於自六世紀後半期以來，Sogdiana 處於突厥勢力的直接支配之下，因而受到了突厥文化的強烈影響，甚至連移居到中國的 Sogdiana 後裔也還帶有這種印迹。這一點也間接地反映出

<sup>21</sup> 岑仲勉《突厥集史》上冊，北京：中華書局，2004 年，頁 116。

該鄉居民最早也是六世紀後半期以後才從 Sogdiana 移居過來的。

龍年即辰年，初唐最早的三個「辰年」有武德三年庚辰歲（620）、貞觀六年壬辰歲（632）、貞觀十八年甲辰歲（644），由於 220 窟建造於貞觀十八年前後，322 窟風格顯然早於 220 窟，所以如果「龍年」記載不誤，則 322 窟建造於 620 年或 632 年的可能性較大。何力率一千余戶至敦煌的時間正是「龍年」（632 年）！也許 322 窟東壁藥師三尊像下題記所提到的「龍年」或與突厥統治下的鐵勒部何力是年率部到敦煌「從化」有關，此發願文或許敘述「龍年請降」一事。

有具體年代的從化鄉文獻是 P.2803《天寶九載（750）八至九月敦煌郡倉納穀牒》，其中提到：

從化鄉，三百六十五碩二斗一升。

但大致年代可考的是 8 世紀初的大谷文書第 1401 號，現存全文是：

……子總張令端……叔牙從化鄉百……之節等……。

這件大谷文書當來自吐魯番阿斯塔納 225 號墓，大谷探險隊盜墓後，1972 年中國學者再次發掘該墓，發現大量來自敦煌的文獻，時代屬於武周時期，有年代的文書最早是 699 年、最晚是 704 年，大谷文書第 1401 號當屬此頃。<sup>22</sup>P.2657、P.3018、P.3559《天寶十載差課簿》中，從化鄉的人名保留完整。最晚有具體年代的從化鄉資料是 P.3952《乾元二年（759）羅法光納度牒錢狀》。

但大谷探險隊從吐魯番阿斯塔納 225 號墓所獲《武周聖曆二年（699）敦煌縣諸鄉營麥豆畝數計會帳》中有完整的 11 鄉名，沒有從化鄉。神龍二年（706）十二月，西突厥首領烏質勒死，子娑葛立，唐封為金河郡王。故將阿史那闕啜忠節與娑葛不和，唐將郭元振奏請闕啜入朝宿衛，移其部落於瓜沙等州安置，制從之。闕啜率部東行，到達初唐以來粟特人居住活動的且末河流域的播仙鎮，舉兵反攻娑葛。陳國燦先生認為：

原居於且末河流域的昭武九姓胡人，在受到闕啜的暴力威脅時，迅速逃往敦煌以求得沙州刺史保護。沙州官府對這大批避難而來的胡人，也當做慕義來歸、從化內附者，在敦煌劃出地域加以安置，并建鄉設制、編入戶籍。

<sup>22</sup> 陳國燦先生對從化鄉也有仔細研究，參〈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原載《敦煌研究》1989 年第 3 期。此據個人文集《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371。

這恐怕就是從化鄉的由來，其時約在景龍元年（707 年）。<sup>23</sup>

約言之，陳國燦先生認為從化鄉建立於 707 年頃。這與池田溫先生的「敦煌的粟特人聚落大概也是在初唐時期建立的，其時間上限最早是在隋代，下限最晚是在七世紀中葉」之說不同。確實，如果 7 世紀中葉之前敦煌就有粟特人聚落，為何前揭《武周聖曆二年（699）敦煌縣諸鄉營麥豆畝數計會帳》中沒有從化鄉？陳國燦先生的觀點值得關注，但仍有疑問：這批九姓胡在播仙鎮舉兵反攻，似乎並沒有到達敦煌。

從化鄉是個「特區」，特點之一就是人少，約是 284 戶，若一戶 5 人，約 1400 人，而《通典》卷 33 記載：

大唐凡百戶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

依此，從化鄉總戶籍只是正常鄉的二分之一。P.2803《天寶九載（750）八至九月敦煌郡倉納穀牒》中，從化鄉應納種子粟「三百六十五碩二斗一升」，是全部 13 鄉中最少的，而懸泉鄉是其 4 倍，有「一千五百一碩六斗九升六合」。

也許我們可以綜合二家觀點。我們知道，自漢代起就有胡人居住在敦煌。初唐突厥統治下的鐵勒部何力率千余戶至敦煌，而後安置甘涼間，有可能在敦煌也安置了一部分鐵勒人。以「突厥至沙州請降」來解釋池田先生提出的「居民的胡式人名當中，可以散見……突厥語人名」等現象，似乎有一定的合理成分吧。8 世紀初一批九姓胡人、吐谷渾人可能遷移到敦煌，由於人數較多，於是設從化鄉管理突厥、吐谷渾、粟特等外來胡人。

本文推測，天寶十載（751）《差課簿》中出現的突厥姓名，與粟特人「受到了突厥文化的強烈影響」相比，更有可能這些取突厥姓名的人本來就是突厥人，或者是突厥化了的粟特人。322 窟西壁三條胡人模仿漢字的題記無法釋讀，可見書寫者漢語水平極差，不當是久居敦煌的胡人，而是開始學習漢字的人。如果結合何力內附一事，有可能就是這批內附胡人所為。西壁三條題記屬於塗鴉之作，他們不到其它洞窟塗鴉，而是到 322 窟題字，大約就是他們落戶敦煌後即來開此窟。池田溫先生提出安達漢、安烏蘇密是突厥人名，而 322 窟西壁正有「安(史?)」姓題記。疑惑的是，本窟造像題材多數是當時敦煌石窟流行的題材，東壁 4 鋪說

<sup>23</sup> 陳國燦〈唐五代敦煌縣鄉里制的演變〉，原載《敦煌研究》1989 年第 3 期。此據個人文集《敦煌學史事新證》，蘭州：甘肅教育出版社，2002 年，頁 373。

法圖下的 10 身供養人都是漢裝，并且東壁門南的漢文題記的書法較佳，似乎漢族人也參與了洞窟的營建。當我們關注 322 窟「胡風」問題時，仍不應忽略該窟還具有「漢風」問題。

最後需要說明的是，儘管筆者認為「龍年」二字是可靠的，但畢竟不是完全清晰，可能不是絕對正確，令當有誤，我們也需要關注突厥文化在隋唐時期是否影響到敦煌問題，希望本文起到拋磚作用。



圖版 1、2、3：322 窟龕內題記



圖 5：322 窟龍年榜題局部



圖 4：322 窟龍年榜題

(以上照片由敦煌研究院數字中心提供)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定編目資料

敦煌學. 第二十九輯 / 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編輯. —

臺北市：樂學，民 101.03

面；公分

ISBN 978-986-88194-0-5 (平裝)

1. 敦煌學 2. 文集

797.907

101005004

敦煌學 第二十九輯

ISBN 978-986-88194-0-5

編輯者：南華大學敦煌學研究中心

nhdh5770@gmail.com

執行編輯：楊錦璧

出版發行：樂學書局有限公司

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10 樓之一

Lexis@ms6.hinet.net

電話：(02) 23219033

傳真：(02) 23568068

定價：500 元

出版日期：中華民國一〇一年三月 2012 年 3 月

# **STUDIES ON DUN-HUANG**

**VOLUME 29**

Nanhua University  
Center for Dunhuang Studies  
2012.03